

发小马国馨

刘心武

可喜又可恨，发小马国馨。
可喜，是收到他2023年9月的新书《南礼士路的回忆——我的设计生涯》，大16开，近74万字，476页，图文并茂，既是他一生事业的翔实记录，也是近六十年以来中国建筑规划设计发展的一大见证。可恨的是，此书比砖头还大还沉，让我不知该怎么翻看。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形成了要么倚读要么卧读的习惯，如今不改旧习，他这书我无论倚读还是卧读都不可能，必须正襟危坐放桌上翻阅才行，你，我都八十有余，何折磨我如此？而且，我前些时还赠他《也曾在窗间窥新月》《觅》两书，他都告诉我到手后不忍释卷，甚至卧读时困乏之书落床下，我的书他可轻松浏览，他的书我却不能轻省翻阅，可我又实在想少把书里丰富的图片先睹为快，最后只得离枕头、弃沙发，老老实实坐到桌前，真是悻悻！

2024年4月19日上海《解放日报》刊登了其记者对我的整版采访《追求美，但不要追求完美》，我通过短信把版面传给了他，顺便把4月17日《文艺报》的一个整版采访也传给他，他立即淡淡地回应：“你的图像很不清，我在电子版上看了，看起来现在社会很需要新的鸡汤，你的《怨》就被记者发现了，我最近也发了两版，一是一周前的《北青》，一是今天的《科学报》。可能读书日快到了，各地都在发。”我回以“巧了，有趣”。他更其淡然：“各报都要来配合读书日来个专版，什么叫‘宠荣不惊’，此之谓也。”

4月23日《天津日报》又刊出《今晚报》编辑朱孝宾对我的大版评论《刘心武：方块字寄深情》，并且这两家报纸连续两天刊出几乎半版的我将于4月27日，作为“海河文化讲堂”嘉宾开讲《红楼梦》中的小人物》的海报，我把版面传给他，告诉他“也要去天津”。为什么去“也要”？因为他3月底刚去了天津，天津大学出版社以他的新书为契，给他搞了个《马国馨：我的设计生涯》大型展览，重点展示天津大学出版社历来为他出版的22种建筑文化图书。他给我传来过相关图片，我回两个字：“辉煌”。

其实不是我“也要去天津”，而是他“又要去天津”，他告诉我：“我26日下午五点到天津，住利顺德饭店，27日上午开会，下午回京。”我27日自中午就不得闲，下午到梅地亚大剧院讲座，就回他“缘怪一面”，他回应“从未用过这个词”，他用没用过，我们都是擦肩而过。

我问他开的什么会，他告知是“文化遗产发布会，十年周年了，纪念一下。天津近现代建筑遗产很多，在遗产保护上也有成就，与上海的做法也各有千秋，所以文物学会和建筑学会联合召开。”我问：“你好像是个什么主席。此类名头罗列起来至少十几个吧？”他答：“过去有些，现在早已淡出，只是去站台，可是主办方为我出书尽了力，”



在父母家翻我的旧书，意外发现书中夹的一朵干花，一寸见方，灰色透明，花瓣脉络丝丝如缕，如蜻蜓轻纱般的翅膀。小时候我经常用顺手拈到的东西做书签，早春几朵紫花地丁，晚秋一片梧桐树叶，最多的是蔷薇花或者蜀葵花，用书压两天，就能成型。这朵花却很独特，完全没有故乡任何花草的影子。我只怔了一下，就想起来，它是从天山飞来的，二表哥寄给我的雪莲花。

一次看电视，无意中看到新疆马兰军营的白杨树林，好亲切，虽然我从未去过，但多年之后马兰这个名字依然刻印在心头，那是二表哥当兵的地方。
二表哥和我大哥差不多年纪，和我二哥一样的厚道笃实。孩提时，他们兄妹六个人每年都要分批到我家玩几天，据二表哥后来告诉我，他们每个人都争着要过年后到我家走亲戚，为了名额可能得提前半年跟大姨预定。我的父母都是温和热忱的人，孩子们无拘无束，自在快乐。母亲会拿出家里最好的吃食，父亲爱说笑话，再加上年龄不同的孩子，都能找到与自己年龄相近的好友，我们也因为表兄妹的加入更加的欢闹。至今记得二表哥爱把两只手捏得关节咔咔作响，在大厨热气的馒头锅中找糖包子，因为烫，他左右手不停倒腾，专注的脸在蒸汽中很朦胧。还有掌灯时分，二表哥坐在堂屋的小板凳上，沉稳地和家人们闲话。煤油灯的光很黯淡，照着满屋子昏黄浓重的夜色，人影憧憧，但一屋子年少的面孔，欢乐的气氛，让冬夜温暖如春。二表哥眉目清秀，皮肤白

有点抹不开面子。”又告“我现是在别人说破天也不离京，主要是在外面睡不好觉，另外也是家里面一切都适应了……”这是不是有些个娇娇二气？他也确实骄傲得起。他1965年自清华分配到北京建筑设计院，就再没换过单位，而北京建筑设计院也一直稳定在南礼士路，所以他回顾自己设计生涯的著作就叫《南礼士路的回忆》。1989年落成并由亚运会使用的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，是他设计作品中最具光彩的，也奠定了他在建筑界的地位。1997年他成为中国工程院的院士，时年五十五岁，其余的头衔职位，如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之类，都不必列举了。除了还没得到国际上的普利兹克奖，国内建筑界的种种奖项拿到手软。他对自己设计生涯的总结，见于此大厚本专著最后的一首诗，其中点睛的两句是“境由心造常忘岁，不随俯仰自伐柯”。

我对他是羡慕嫉妒，但不恨。羡慕嫉妒的，还不是他在专业上的成就、所获得的光环，而是他的居然一帆风顺。我们是高中同学，成长的社会环境是完全一样的，我们在班上，又都是功课成绩名列前茅的，也都算多才多艺，但到1959年毕业参加完高考后，他一举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，我开始几乎完全落榜，后来由于师范学院招不满额，才把我勉强录取到北京师范大学，这样我们就等于一个鸿鹄在天，一个泥鳅在水。直到改革开放以后，我才算“咸鱼翻身”（此词又写成“咸鱼翻身”，我以为不妥，已被腌渍的鱼即使翻身，也还是死鱼，“翻身”则是死鱼逢好时机居然又变成活生生的），圆了作家梦，通过不懈地写作，算是创造出了一点价值。我当了十三年中学教师，积累了相应素材，1977年写出、发表短篇小说《班主任》，引起轰动，一举成名，进入文坛。

我不仅早年高考失利，中年以后颇屡也颇繁且剧烈，但马国馨呢，他却“风正一帆悬”，总能“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”。他们清华建筑系学制五年，算来应该在1964年毕业分配，但又增加了到四川三线建设前沿的实习锻炼，这样，他于1965年分配到了北京建筑设计院。1966年至1968年，设计院的业务完全停顿。1969年逐步恢复业务，马国馨接到的第一项任务，是为人民日报社设计一个自行车存车棚和一个男女各有、一个公厕的公共厕所。他很认真地完成了在设计院的这项处女作。

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，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，中日恢复了正常外交关系，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，中美次年在对方首都互设联络处，这期间中国的邦交国不断增加，北京的使领馆及其他驻华机构人员越来越多。设计建造一个供外交人员使用的国际俱乐部的任务，落在了北京建筑设计院。马国馨作为院里的新生力量，理所当然地参与了设计工作，并以自己富有创意的设计方案崭露头角。

1976年毛主席逝世，党中央决定保存遗体，并建造毛主席纪念馆。从全国调来的老、中、青建筑师组成班子，担当设计任务，马国馨是北京建筑设计院的代表。最后确定的方案虽然算是集体创作，但作为基础的，是马国馨的设计方案。它坚持了毛主席本人所喜欢的平屋顶、整体舒展大气，借鉴了国外这类建筑的某些优点，更在细微处采纳了中国古典元素。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

际，北京电视台录制了建造毛主席纪念馆的专题片，马国馨出镜，在纪念馆现场回顾了那一段难忘的岁月，他徘徊在廊柱下，抚摸着把大理石表面打磨成灯芯绒质感的柱体，感慨万千。

马国馨主持设计的大型公共建筑，还有供亚运会首用的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，以及北京首都机场T2航站楼。他作为设计院总建筑师所指导、审批的如北京火车站西站等，就更多了。但是进入本世纪，北京的大型公共建筑如专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建造的主会场（俗称“鸟巢”）、天安门广场西南侧的国家大剧院（俗称“水蛋蛋”），以及首都机场T3航站楼、大兴国际机场，都是外国建筑设计师的作品了。马国馨曾就此向有关部门领导进言，发表自己的意见，认为外国建筑设计师的作品存在明显缺点，而未中标的本土建筑设计师的作品（不限于北京建筑设计院的，其实有的比采用的更精彩、更合理、更节省、更符合国情，也更符合一般民众的审美心理，他把进言信，收入到了自己的论文集中，留给后世参考。

他直到2019年才以77岁高龄正式退休，而我早在1990年后就无职赋闲，2004年就正式退休。马国馨一生顺遂，功成荣退，在同辈人中，属于翘楚了。

我的助理焦金木帮我整理旧物，找出我高中时期的一些绘画，其中有一幅是我给马国馨画的像，我传给他看，他说：“不像。怎么不像？说老关说眉毛就不像，老关，是他对夫人关蓉蓉的昵称，我不免总想，那时候‘老关’根本没见过你，怎么能判定不像？他立刻提醒我：1959年我们不就都上了清华吗？那幅画是1958年画的，人家两位第二年就双双考入清华同一专业，就一见钟情，毕业后都分配在北京，就结为夫妻，到后来人家的独生子结婚后，生下一对双胞胎孙儿，两个人虽然单位不同，却都参加了毛主席纪念馆的设计建造，如今在清华大学校友合唱团，两个人在不同声部，配合着唱同一首歌，噫，他的爱情、婚姻、家庭，也与事业一般，逢山有隧，逢水遇桥，无比顺遂，无比圆满，让我羡慕、嫉妒到，必须再无语地为他们深深祝福的程度！”

高中同窗时，我们两个最能玩到一起，暑假他回济南家里，我们会通信，他给我寄来用塑料绳细扎住的小画册，里面配图写些调侃我的语句。我给他的信，会在信纸左上角先绘制出水彩画，再用钢笔写信。

记得齐白石去世后，在当年叫作苏联展览馆，现在叫作北京展览馆里面，用几个大厅，举办了展品极其丰富的纪念展。我们一起去观展，手拉着手，互相传递被震撼的心电。

那时候教室后面有与黑板等大的展览板，我们常在上面展示各自的画作。本来以为，毕业以后，他人清华，我入北大，或者还可以一起在朱自清徘徊过的高墙边，或在塔影荡漾的未名湖畔，方便地维系我们的发小之谊……我去师专报到不久，就接到他从清华的来信，内容很简单，就是希望不要失去联系。我把那封信撕了。

那以后我用了十八年的时间，终于显示出我通过自尊、自强、自立、自主，为社会提供的价值，以及我自身的价值，都并不逊色于持有清华或北大文凭的人士。改革开放以后，我和马国馨在建筑界与文学界的跨界活动中重逢，他就像我们一直没有间断过联系一样，对我嬉

笑怒骂，皆成文章。

我们是上世纪四〇年后的一代，马国馨在清华建筑系的时候，还需要用鸭嘴笔、半圆仪之类工具绘图，还要用一种叫做计算尺的东西拉着进行计算，后来全球科技突飞猛进，中国改革开放后大步跟上，上世纪90年代后引进了电脑，那以后年轻的一代设计师开始用电脑进行设计。马国馨的这本出版于2023年9月的回顾其设计生涯的巨著，里面充满了设计图，但都是手绘的，几乎没有电脑三维图像的截图，虽如同作家手稿一般珍贵，却也意味着他已属于老派。他自己说，基本不用电脑。我提议使用电子邮箱联络，他说虽有邮箱，很少使用，我们俩至今基本上不用微信，也很少直接语音通话，基本上是使用短信沟通。这肯定令许多人瞠目结舌，怎么守旧如此？但我们自有乐趣于中，“高情不入人眼，拍手凭他笑路旁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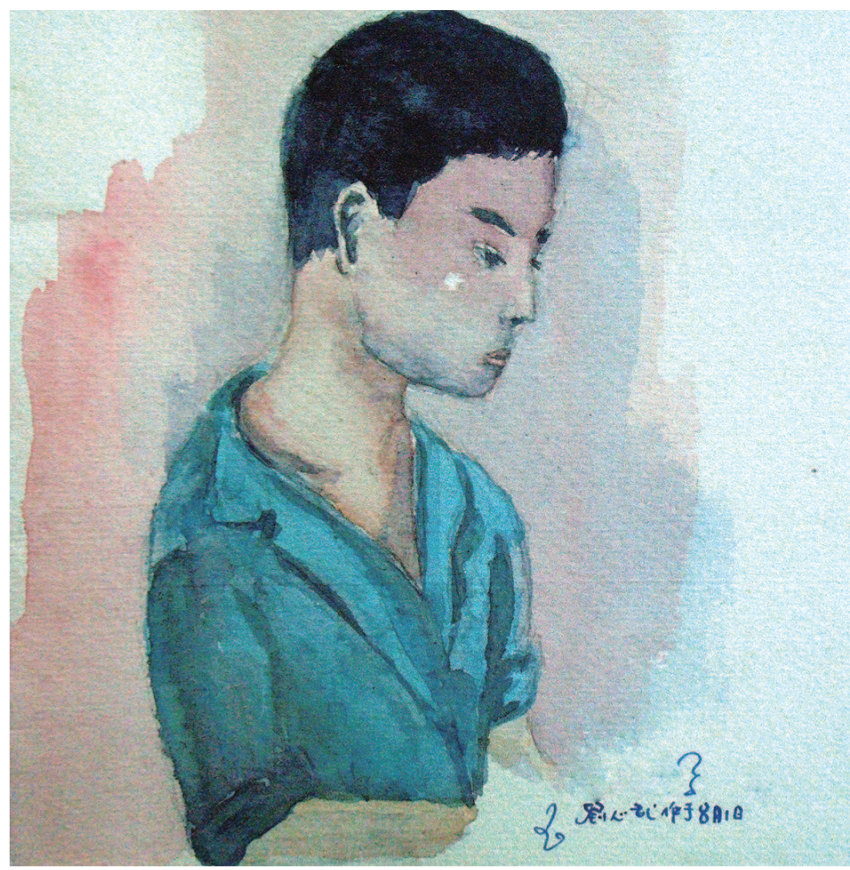
想到几十年马国馨对我不弃，我曾改唐司空曙《喜外弟卢纶见宿》一诗中的四个字，赠与他：“静夜四无邻，荒居旧业贫。风中黄叶树，灯下白头人。以我独沉久，愧君相问频。平生自有分，况是恰同庚。”他却并无其鸣，反问我：“你怎么独沉了？”但他顺便告知我他的一个观点：“一次和建工出版社年轻编辑座谈，我说一个人除了生理生命外，第二条生命就是（寄存于）认识他、记得他的那些人的生命，第三条就是看他的思想、作品、理论的生命。书比人长寿。”马国馨设计建造的巨大作品，还有他的一系列著作特别是这本《南礼士路的回忆——我的设计生涯》，是他的第三条生命，应该可以长长久久地延续下去。

他称已经患上帕金森症，写字时手抖。他在短信中说：“一想法了八十多也够本了……你想，喜怒哀乐，生老病死，就差最后一个字了，又经过抗日、民国，至今，那么多事都让咱们经过了，真是值了。”他和我都很豁达，都明白廉颇老矣，后生可畏。

我们都出生于1942年，现在无论建筑界、文学界，40后都在渐次隐退，50后大行其道，但60后、70后浪涛滚滚，80后、90后也显露头角。他说他在建筑界的活动中，开始是坐后排，后来能坐前排，再后来能坐到主席台一侧，现在却会被安排在主席台中间，合影时也会站到C位，但这并不意味着芝麻开花节节高，只意味着前辈在相继离世或失节，自己现在最应该提醒自己的，就是要为年轻的建筑设计师们助力、喝彩。

他感慨地告诉我，他的恩师，清华大学建筑系原系主任吴良镛先生，目前已经进入医院ICU插管子了，但吴大师的儿子，也是他的学弟、同事吴晨主持设计的北京最高楼宇“中国尊”，已高耸云霄，标志着他们这个行业的生生不息，前景无比璀璨。

我也告诉他，自己意识到，老并不成为一种资格，前些年，我被认为是比较能跟进新事物的“潮老头”了，也能谈几句苏珊·桑塔格、赛义德，但是现在此二人也都离世二十来年，成古典了，眼下有年轻人来跟我提起马克·费舍的《资本主义现实主义》，以及韩炳哲《倦怠社会》，我就茫然无知，遑论与其讨论。但小我27岁的中年交卸华栋，他几乎每天都在发布文化界新信息，比如最近一周，我就看到他相继推介藏族作家马才旦遗作《松木的清香》、美国保罗·奥斯特斯的长篇小说《4321》、中医作家李清源的《窑变》、



右图：马国馨小像，刘心武绘于一九五八年。左图：一九九八年，马国馨（右）和刘心武摄于母校——北京六十五中。



青年作家陈崇正的长篇小说《归潮》、波兰诗人辛波斯卡的诗歌……他还发布了《从小说到sora：人类与AI创作相比，孰美？》的座谈纪要，我要跟他学习吗？在余年残生，我不再强迫自己“活到老，学到老”，他所推介的作品我没有力气去读，我只能保持自己对写作的热爱，利用已有的储备灵感的闪动，活一天写一天，直到马国馨列出的那八个字最后一字的到来。

发小之谊最可贵的，就是能相互调侃到底。2024年4月26日晚他们都在天津，我住在津利华，他下榻在利顺德，其实离得不远，但毫意之年都难以挪动，这还是短信逗贫嘴，我故意这样告诉他：“活动赞助商送我一辆汽车。”还故意打出汽车符号。他就故作惊讶：“哇，什么车子啊！”也打出汽车符号。接着他打来电话，和以往一样，故意用小嗓发出阴阳怪气的声音：“马路社采访著名作家刘心武，得到一辆新汽车感想如何？可否讲述一下赠车现场的盛况？”我就故意讲述自己殷殷期待，结果人家带来一个大纸盒，打开后，是一辆最新型号的电动车模型……他就在那边笑起来，我也笑，后来他短信里写：“记得我俩大笑近两分钟。”我回应：“好久没有如此开心了。”他再写：“也不是你，我还敢放肆一下，别的地方都行。”

我把27号讲座的照片传给他，他立即评论：“服装太俗，没有品味。”我穿的是一件红色唐装，是助理焦金木此前为我录制视频时特意准备的，穿此服拍摄的照片成为我的“标准照”，网络上早满

天飞，喜马拉雅平台上，天津海河文化讲堂的大海报大版板上，也都用的穿此衣的形象。焦金木见马院士短信后颇为不悦，我怎么跟他说呢？我和马国馨之间的互惹互讽以及自贱自嘲，释放出我们心中多少情趣与通透啊，怎是他人能轻易小觑的？

28号马国馨已返回北京家中，但他们那个活动仍在利顺德大饭店举办，我按预定计划，28日从津利华转移到利顺德，故意站在他们那个“第九批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推介暨20世纪建筑遗产活化利用城市更新优秀案例研讨会”的大版板上，让焦金木给我拍了张在一侧立正的照片，传给他。他立刻微信传来打油诗：“津城演绎红尘道，云山雾沼论须眉，百年旅店再盘桓，俗人抱得车模（女）归。”利顺德开店于1863年，我带焦金木参观了其博物馆，焦金木对马院士那车模后注一“女”字颇难释怀，我却觉得今生今世，有此一发小放肆调侃，正是难得的福分，遂也立即回怼一首：“黄鹤已去登楼迟，赠会有木一憨痴。浮生若梦休笑我，八字仅剩一字施。且喝中庭下午茶，哪管品低遭人嗤。俗人抱得车模归，眼红岂独马大师。”焦金木读了我这首笑了，说终于体会到了我们发小之谊中的甜蜜。

夕阳箫鼓中，不管我和马国馨谁先落实那“最后一字”，我们都会静穆中感恩时代，感恩机遇，感恩我们享受到的亲情、爱情与友情。

2024年5月15日 温翰斋中

我的天山雪莲花

魏芳芳

像我那沉默寡言的大姨父。右脸颊靠近鼻子有一颗大痣，说话的声音很清脆，像大姨。
我那时候小，哥哥们都不带我玩的。我就和同来的小表姐看连环画《狐狸的脚步》，还有一本《马兰花》，讲大西北的一个关于马兰花的童话故事，我们最爱听画中的仙语：“马兰花马兰花，风吹雨打都不怕，勤劳的人们在说话，请你马上就开花。”女孩子们扎堆一起喊：“请你马上就开花！”满堂的大笑。谁也不知道，在皖北那个小村的一群女孩子们的欢笑声中，冥冥之中有一种机缘注定，几年后，二表哥中学毕业去当兵，去的就是新疆马兰。

二表哥去马兰的时候，我已经上初中了。他穿着军装，英姿飒爽地来我家看望母亲，印象中那个穿着打满补丁衣服的少年，在崭新威武的新军装里，一下子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把我们的茅屋映得蓬荜生辉。我不敢认了，他脸上的痣提醒我，这就是那个和我们一起锄地

的二表哥。他给母亲留了当兵的通讯地址，说会给她写信。新疆万里迢迢，那时通讯只能靠电报和信件。于是，满怀着对外面世界的渴望，我开始代我母亲给她写家书。三十多年过去了，我依然清晰记得九里沟中学的收发办公室，经常有一封牛皮纸信封，印着红色的新疆马兰某部队的字样，那是二表哥给我的回信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我们几乎没有出过县城，二表哥是唯一一个在远方生活的亲人。

在信里，我读到了地图上看过的天山山脉，茫茫戈壁滩、寸草不生的盐碱地。背诵王昌龄的边塞诗时，仿佛能看到马兰淅沥的风沙，卷起漫天烟尘。二表哥是汽车兵，他开着卡车驰骋在辽阔的边疆，像古诗中策马扬鞭的边将骑士。那时候村里放映电影《冰山上的来客》，新疆美景和真假古兰丹母的故事在小伙伴的话题里火了起来。二表哥和他的信就成了我吹嘘的资本。我信马由缰地说新疆跟天堂一样美，天山山

上全开着洁白的雪莲花。雪莲花是天山的雪水浇灌出来的，比雪还要白。小伙伴们将信将疑，我就写信给二表哥要他给我采天山雪莲。他说马兰这个地方都是戈壁，看不到雪莲花啊。我很失望，但我像个顽皮狗，每次写信都坚持索要雪莲花。也许他一封一封的信催得多了，他无论去哪里都要留意雪莲花。终于有一天，我收到了他夹在信里的一朵灰白的干花，说是拉练时在山顶上采到的，鲜的不能看，只能压成干花。薄如蝉翼的花瓣，晒得枯灰，毫无一点雪莲花的雪色，但我还是非常非常兴奋——我终于亲手触摸到天山来的雪莲了，仿佛还闻到了雪域高原的清芬。这是我接收到远方世界的第一件珍贵的礼物，却没显摆出来。也许是花朵不像我吹嘘的那样白，或者是花瓣太薄太脆，怕小伙伴弄坏，少女的想法，就是这么变化无常。

就两年的工夫，二表哥在部队立功，提干后考到昆明一所军事学院，一

下子从遥远的大西北去了遥远的大西南。考上大学后，也许是功课繁忙，也许是老山前线战事紧，他的信写得少了，但昆明四季如春的美景还是会出现在他的信里。他写信总让我好好学习，衣物被褥都是补丁摞补丁，但他每次写信，总是要问我老山前线怎么样了？歌曲《血染的风采》传唱大江南北，我们这一帮小孩子被老山前线的宣讲故事鼓动得群情激昂，做梦都想当兵，恨不得立刻去蹲猫耳洞。

二表哥的信给我打开了一扇通往远方的窗。中国如此辽阔，二表哥靠着自己的努力考到昆明，这也给我很大的鼓舞。等二表哥转业回到老家县城，我已经去上海读书了。从此天各一方，再也没有写过信。每次匆匆回故乡，大姨健在时，我和母亲都会去看大姨，但没怎么和表姐表哥们见过面。时光荏苒，白驹过隙，转眼三十多年过去。前年秋天，在父亲的葬礼上，我见到久违的表哥表姐们。表姐们变化比较大，两个表哥却没有多少变化，尤其是二表哥，可能是当过兵的缘故，看起来非常年轻挺拔，眉宇间还是少年时的敦厚朴实。多少年不曾见面，虽然他把脸上那颗大痣做手术切掉了，我们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彼此。二表哥感怀我父母对他们种种的好，说他们读书的学费都是我出的。而且二表哥当年跟我父亲在学校读书，周末都是住在我家的。他有一次弄丢了我爸新买的自行车——上世纪70年代，一辆自行车多么珍贵，堪比现在丢了辆汽车，父

亲居然没有责怪他……这些事我都不知道，父母从未提及。大姨是母亲唯一的姑表姊妹，都是独女，两家常格外亲。大姨家在砂砾遍地的高岗，地贫瘠，孩子多，日子过得比我们家苦，常闹饥荒，衣物被褥都是补丁摞补丁，但每年她花生和糯高粱下来，总要挑最好的送我家。母亲劝大姨要孩子们上学，自己“睁眼瞎”，进城连男厕所都分不清，下一辈可不能。大姨说，嘴顾顾不住，还讲什么念书？但她还是听了母亲的话。我只知道两个表哥靠读书改变了命运，表姐们都念过书，没吃过文官的苦。却不知道原来背后还有我父母的默默资助。二表哥给父亲棺槨磕头，眼角闪过泪光。我也打心里感激二表哥旧事重提，让我对我的父母了解更多，改变了我对父亲情感狭隘的偏见。

有人说世界的尽头是故乡，对我来说，一旦回到故乡，那些在外奔波的几十年岁月就化为风烟，我仿佛从未离开过脚下的土地。表兄妹们彼此面对面毫无隔膜，依然是少年时热烈的情谊。回上海之前，二表哥拎了一大包家乡特产来送我，那包好沉，我差点没拎动。



「文汇报」 微信公众号